

◎ 知青妹子三部曲 ◎ 第二部

# 我的 圣女

谭元亨 著



知青妹子三部曲

第二部

谭元亨 著

# 我的圣女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## 再版序言

# 知青三十年祭

### 一

写下这么一个标题，我不禁自问：我祭的是什么——是“知识青年”这么一个已成为历史的专有名词，还是三十年前那场人为的逆历史而动的知青运动呢？

也许都是。

然而，又不仅仅是。

“知识”这么个定语，能加在当年仅读过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身上么？如今“知识分子”这个词，已经有不少争论了，一般来说，该是指的一代精英了，连大学毕业生也未必算得上。可是，当年仅十五六岁，刚读过初一，经过两年“文革”的孩子，却明明被冠以“知识青年”的名号，从而缓缓被赶进了近乎原始蛮荒的山野、湖泊、边陲，去受什么“再教育”——知识，也成了某种可以倚以加罪的借口……

所以，被祭的，更是那个蛮荒、愚昧的历史时代，一个用现代文明语言来构筑的原始蒙昧的岁月，一个用金碧辉煌的理想来垒起的空中殿堂……

然而，在顷刻间，这一切都轰毁了，扬起了漫天的尘埃。尘埃散尽，我们还剩下什么呢？

### 二

刚刚在电视台作了一个即兴的“现场直播”，讲的正是这

过去了三十年的知青历史。

也许，时至今日，我们才能比较清晰的看到这一运动留下的历史遗产。

这便是如今流行于民间的一段韵文：

长身体时只能吃糠，  
上大学时偏要下乡，  
改革开放回城待业，  
人到中年又得下岗。

这还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，可也渗透了这一代人的苍凉与无奈。知青运动三十年，老三届的已是年近半百了，新三届也有四十上下。因为上山下乡，荒废了学业，这一批人绝大部分身无长技，在工厂里顶多只是个熟练工，也就是说，既无技术上的优势，更无年龄上的优势，还得带上家庭的拖累——已是上有老下有少的一家之主了。上面一代，有革命老本可吃，拿离休金；后面一代，不仅年轻，且有高学历。这一代人，没法与人家竞争。命中注定，除开个别精英外，他们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被一笔抹掉了的。当我冷静地写下这一句话时，我竟不由得心悸起来。

直播之后，我立即接到一个又一个的电话，一连几天，通过学院总机转来的，几乎没停过。有的，可以说是声泪俱下，怎么也说不完，打不断……

我无法慰藉他们。

过去已是铁铸了的历史，任何人也无法改变了的。

这一代人，承受的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苦难，中华民族整整一个民族的苦难，也是共和国的绝大部分的苦难——除开“反右”之外。

用这些苦难，换取几部哪怕可以称得上是史诗的文学巨

著，也还是得不偿失的，更何况没有史诗，也不会有史诗。它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，与人类历史上任何宏伟壮丽的大跨步的前进，都无法相比。人类，没有必要，也不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！

我们，我们知青这一代，所经历和面对的，本就是人类所力图避免或绕开、所不愿面对或抗拒的一段扭曲了的历史，这就注定了这一代人最终只能寂灭的悲剧。

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

### 三

可我还是要说。

不仅要说，而且写下这部近百万言的知青三部曲。

写完了，也仍旧没有说完。

更何况，它均是十年前，乃至二十年前所写完的呢。

这三部曲，人们会发现，它们选取的，是一般知青文学所没有的独特的视角。它们无一不是讲的知青中的“佼佼者”，被时代潮流推到了风口浪尖的角色个人命运。因此它们也就有了别的知青文学所无法取代的历史视野。如同评论中所指出的，它不仅仅是对知青历史的审视、对女性命运的审视，也是全方位地对我们民族生命形态的历史性审视——是的，这一代人，由于青少年时代所背负上的灵魂十字架——巨大的心灵创伤，从而导致今天的信仰危机、人才匮乏、人文传统断裂。多少本来可以成为精英或志士的，最终在灿烂的前景降临时消失了、沉沦了，大都刚到五十便办了退休，或沉缅于烈酒，甚至有的还卷进了死灰复燃的黑社会里。他们的生命史，本不应是这么写下的……

这能责怪他们么？

从懂事之日，他们便丧失了自我。这也是《我的圣女》卷首中所称的“完美，等于毁灭；寄托，便是断送”。包括上山下乡，无论当日多么虔诚与狂热，也都是被安排下来的，他们只能服从，而从来不可能有选择。无可选择。当“齿轮”与“螺丝钉”，那是一种荣幸，比升天堂更为快乐……那么，到了今天，他们还能找回自我么？沉沦、自戕，种种，在他们也是早为历史所注定了的，过去抓住了今天，他们同样别无选择！没有谁有权力谴责他们，哪怕上帝！

所以，他们注定要早早地进入坟墓——不，他们还活着时，便已经给埋掉了。

这便是驯服的蓉蓉的命运。

也同样是桀骜不驯的玮玮的命运！

他们谁也逃不脱！

#### 四

但我还是尽可能把她们写得清纯一点、美好一点，她们的生命本来还是很有价值的。就算是蓉蓉，她也绝对不是个坏女人，“圣女”绝对不是为的反讽而加在她的头上的。

我写她们，不是为的谴责她们，更不是要抛弃她们。

她们同样属于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所以，我对这三部曲才如此情有独钟——在前所未有的劳碌与困顿中，几乎把什么都要忘掉的时候，我仍记得起她们。

她们，更是我历史的一个良知。

所以，她们才带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，一直活过八十年代，

活到九十年代，而且，得活到二十一世纪。中国人在她们身上，多少可以看到一点自己。不少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寿终正寝了，但我却希望她们能活得长久一些。

尽管手头上的书稿、剧本，以及来自报刊甚至海外的约稿，在案头一直堆积着，沉甸甸的，但我还是把这部《知青妹子三部曲》摆在了前边——不为什么，只因为我也是个知青。我的劳碌命，也许就是那时开始的，而我的文学创作生涯，则确凿无疑从那时开始——也就是说，我的苦难与我的幸运，都同时有一个没法分开的起点。近年来，知青文学热方兴未艾，由小说而纪实。因此，也有几个出版社找我，商量再版这个三部曲。当年，它们也曾有过辉煌，一版再版，数以千百计的知青给我写信以倾吐心曲……如今，离最近的一版，已过去了整整十年，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它们。

“知青情结”，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无法摆脱开的。如今四十至五十岁的这一代人，业已成为社会的“中坚”。中国今日的崛起与困顿，与这一代人是分不开的。这就是知青文学热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。这一代人经历的历史磨难，不独属于这十年，也属于这个世纪；不独属于中国，也属于整个人类。因此，知青文学，也就不只属于知青、属于今天，更属于人类、属于未来。后人必将会在知青文学中破译出众多的历史遗传密码，以期走向一个可信的未来。

这就是十年后，为什么仍有电视台会提出把它们改编为电视剧，而出版社仍要再版的根本原因。

人们难免不为这一段历史的迷误而悲哀、而愤嫉，更为我们这一代人所付出的空前的代价而痛心、而惋惜——的确是空前的，几千万人的十年，怎样贻误了一个民族的生机！但是，这一代人并没有全部沉沦与自戕，他们始终在思考、在追求、

在奋斗，从而积蓄有今天这样的凝聚力与推动力。他们不曾全在铁灰的现实面前跪倒过，他们有的人将以伟岸的身躯永远屹立于史册之上，以示其精神之不坠！

知青的历史悲剧，是一个古老民族所无法回避或躲开的，或许，正是需要这种回光返照式的历史悲剧大集成，一个民族才会痛感自身的衰颓而去求得更新；抹掉了一代人，是为了更多代人站得更高……该被否定的是历史悲剧而非知青自身，人们不曾也不可能否定某一个历史形成的群体——它毕竟铁铸地存在于历史之中，虽然它不再，也不该再在历史中第二次出现。

但是，我们却清醒地意识到，不应该、也不可能因为这种知青的“自恋情结”，而失却对曾有过的历史迷误的批判，那并不是维护知青自身，相反还是对知青的一种侮蔑。事实上，在不少知青文学中，尤其是早期的知青文学，由于这种“自恋情结”，从而失去了这种批判的目光，让人得到错误的结论。道德的“自我完善”从来不是知青文学所追求的，更不应该以此取代历史的批判。在这点上，我很感激赵小琪对这三部曲的评论。他无疑是把这一批判上升到了历史文化的高度、审美的高度，较为接近了我写这个三部曲的初衷。所以，我特地把他的这篇评论，连同另外两篇，附在这三部曲的后边（见《我的神女》评论部分）。

## 五

这三部曲之所以组成一个“知青”系列，也正是立足于一种较为深刻的历史反思。作品中的主人公，大都跨越了知青的时代，走向了“后知青”的阶段。我想，在林林总总的知青文学



中，这组三部曲应是以其激情中不乏清醒、愤嫉中力求深刻而显示出其独有的风格，引导读者——自然也是我的同时代人走向哲理的思考，把“知青”这一历史现象放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上去认识。如我在《中国文化史观》一书中曾说过的，每每激情的批判总是掩去了理性的思考，从而无法走向深刻而留下了“后遗症”，这一教训已是够多的了。

我们是被放逐的一代，罪过却不在我们的身上，而是放逐我们的时代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当中不少人仍旧在被逐，他们无法走出那个岁月造成的心狱，无法回到正常的人的生活中来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落在头上的精神苦难是难以解脱的。

我之所以写这个三部曲，也正是希望或多或少解除这种精神上的苦难。

为了他们。

也为了自己。

是的，我迄今仍未能从这种精神苦难中走出来，以至仍有人视我为苦行僧，为清教徒，为理想主义者。而我，仍旧摆脱不了劳碌命，甚至在写得兴起之际，忽然感到一种恐惧，要跑出门外，骑上自行车满城转个圈，以证明自由的存在。

可那证明的只是躯体的自由！

而精神上的自由呢？

似乎从那个岁月便已经失去而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我自己也当不了自己的救世主，更何况别人呢？记得八十年代之际，很多人把文学当作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，作家自然也成了青天大人，这也是这三部曲畅销的原因之一。当日，在作家协会，下去挂个副职，也就被老百姓团团围住了，要给他们一个公道。我也曾力图这么去做，但左冲右突，成效甚微，

最后只有一个“对不起”，便逃之夭夭了。这也许是我惟一一次当官的业绩，只落得这三个字——在短短三个月间，当我向人们讲起这番经历时，一位长者却正色道：“也难为你了，这年头，当官的有谁能对老百姓道上一声‘对不起’的，一个个谁不颐指气使——能道上一声‘对不起’的官，也算得上青天大人了。”

我惟有苦笑。

不料又过了十年，奉命写一个焦裕禄、孔繁森式的人物，竟发现他生前对老百姓也总是这么一句“对不起”。

他是给累死的。

也许正是这个“对不起”，才引起我的共鸣，决心去写这么一部被人视为吃力不讨好的作品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历史的大回旋之中，个人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，但对于信任我们的布衣百姓来说，我们能忍心说上一句“这不关我的事”而不说“对不起”么？

明明知道这只是一个安慰。

的确，这么一个三部曲，也只是为了一个安慰，一个“对不起”，它里面所针砭的一切，并不可能因一两部书便可以解决。它只是一面镜子，历史之镜，也是今天与未来之镜。

## 六

除开这三部曲是专写知青之外，在我的众多作品里，也都少不了知青的影子，如《客家魂》中的元戎，《客家女》中的学文等等，有人认为那有我个人的痕迹，其实那难以置信的苦难加在我头上的远比作品中这些人物更甚。因此，当年在湖南省作协与我相交至深的便是张扬，我们都有着一段共同的不幸

回忆——牢狱之灾。他，算是最早一批知青了。至于这三部曲中，虽没有我的影子，但不能说，没我的至情！

这一百万字，只是为了倾吐这一番至情。

当然，为了这份至情，才走进深沉的思考之中。

从而又保持了一份清醒。

说到底，它仅仅是为这么一部历史，留下一份清醒的记录罢了。

但愿人们能从中读出点什么——不仅仅是历史。

那段历史已过去很多年了，相距今天很远很远……但是，偶尔间，你又会觉得很近、很近。你身边发生的一切，无不打上那个岁月的烙印，于是，晚上竟又会出一身冷汗而惊醒。那样一个噩梦给民族心灵的创伤太大了，以至这个世纪恐怕也难治愈。《我的圣女》中有一段话，为不少友人所欣赏：“克格勃又算什么，对于精神的奴化而言，它也算是一种历史进步了。”这绝不是反讽，纵然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反讽，但这句话不是。

至于人们怎么理解它，又何须我多言呢？

《我的圣女》中，老实得过了分的蓉蓉死了，那是作为殉葬品而死的；《我的神女》中，精明得过了分的玮玮也死了，也同样是作为殉葬，纵然那个时代早已死了，可她还逃脱不了殉葬的命运；只有《我的倩女》中平平常常的肖一萍还活着，并不是我偏爱她，也许，在蓉蓉与玮玮身上，我注入有更多的同情与怜悯……

但仅有同情与怜悯是不够的。

著名的文化大师陈寅恪有一句名言：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苦痛……”他这句话，说出了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动荡、嬗变的大背景，也说出了在这大背景下作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内心疾痛——这是无可回

避的。当然，这也是我，也是我作品中主人公的疾痛，这三部曲，当是这种疾痛的产物。

所以，三位人物的命运，如赵小琪所言，已超出了知青的命运。

那是这么一个古国女性的命运。

甚至也超出了女性的命运，而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的命运。

人们诧异，《青春之歌》的作者杨沫，何以出了个写《血色黄昏》的儿子老鬼？

其实，这在我身上却是可以合而为一的。在文集的前一辑《历史的良知——潘梓年、潘汉年、潘菽纪事》<sup>(注)</sup>中，难道我写的不是《青春之歌》中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良知么？他们（或她们）义无反顾的选择，时至今日，难道不一般无可指责么？

可我，也写了较《血色黄昏》更甚的这个三部曲，这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良知——如我在《我的圣女》开卷中所写。

如何深刻地认识我们的自身、我们的时代、我们的文化，这不啻是痛苦的——“三潘”们的痛苦，与三部曲中三位女性的痛苦，应该说是同源于一处的。在这晨昏交割、暮鼓与晨钟同时撞响的世纪之交里，文化的苦痛总是这般刻骨铭心、不堪重负的。

每每写到这些人物的死，我总抑制不住眼里再淌出一行浊泪。

几代人寂灭了。

但未来还在。

而且更为沉重——如《我的神女》中玮玮的遗言。

那就让活着的肖一萍们去承担吧！

关于这个三部曲，我不想再饶舌什么了，但愿它是我最后的精神浪迹。

谭元亨

1996年8月26日初稿

1998年2月28日改毕

(注)已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，更名为《潘氏三兄弟：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全息摄影》。

## 开 卷

朋友：

提起笔要给你写上这么一封信，我竟又感到茫然了。  
说什么呢？

还是从你笔下那莽莽苍苍的湘东山区说起吧。如今，我几乎没有一个梦能脱离得了那个神秘而又遥远的地方。是的，我整整一个青春的岁月，都是与它那迷惘、沉重的山岚联系在一起的，都是与山路上那渗着殷红的血水般的树脂分不开的，都是和山上那悠长的，时而恐怖、时而欢快的呼啸声扭结成一团的。你也许见识过那如黑墙般有形有体、无法逾越的大雾，见识过那些狰狞可怖的嶙峋乱石，甚至了解过湘东人“谮天”的积习——那是一大早起来，双腿跪在砧板前面，高高扬起菜刀，一下接一下地砍在砧板上，而后便同时诅咒起老天来，咒天时不利，咒人间不和……咒天，有没有作用，则不得而知，多多少少是出一口怨气，那年月不咒天又咒什么呢？至于咒人，被咒者无论是谁，都必定会丧魂落魄一般，不知有多少日子恍恍惚惚而不得解脱。也许，湘东人独特的叛逆性格便由此而缘起。否则，炎帝神农氏何以在大败后能在这里存身，这些天生的失败的英雄永远有吐不尽的怨气；同样，当年工农红军何以能以此为据，抗击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，在野的绿林好汉们从来与正统格格不入！

啊，我的神秘的罗霄山脉！

我很高兴看到你写的关于湘东山区众儿女命运的三部长篇《我的神女》、《我的姊妹》、《我的星辰》<sup>注</sup>。它们让我

又重新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地方，回到了那刻骨铭心的岁月。我知道，你是在写我们这一代人——与共和国同年的一代人的命运。但是，我始终觉得，你不需写尽一切。诚然，她们是女子，是天生的弱者，她们叛逆的天性，只能曲曲折折地反映出来，而南方的阴柔之气又未免太重了一点。“神女”遁世的传奇般的经历，“姊妹”们在尘世间的几度挣扎，命运的“星辰”几度隐现，你都赋予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与沉重的反思。谁说中国人缺乏悲剧意识呢？

但是，对代表那个年代的典型，你只浅尝辄止。虽然在这三部作品中，这类人物都被提及甚至出现过——这便是其中写到的蓉蓉，可你却不曾浓笔重彩去写她，去写这么一个完全是那个年代钦意培养出来的完美无缺的人物，去写那么一部完美无缺的悲剧——那些岁月里，人们不都竭尽全力地将自己封闭在一个自以为完美的最高境界之中，却在一个极为冷漠的世界里茫然地走向了最后的毁灭么？一个又一个的运动，最后来个完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——政治在日臻完美，文化也日臻完美，那么，现实中的人不也在日臻完美么？

于是，便有了蓉蓉！

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完人呢？

毫无疑问地，在那个年代的道德标准上，她是再完美不过了的。当一代人按照这完美的模式塑造时，将面临的是什么——这，难道不该写一写么？

别忘了蓉蓉的绝笔：

---

注：《我的神女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；《我的姊妹》出版时更名为《带刺的白榴子花》，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，本次再版时更名为《我的倩女》；《我的星辰》已竣稿。

“完美，等于毁灭，  
寄托，便是断送，  
但愿我所经历的一切，  
只是一个荒诞的梦  
……”

如果仅仅是一个梦，那当然好。然而，这绝不是梦。当人们完美到如此状态，漫长的中世纪便不会被动摇了。中世纪恰巧被哲学家们称之为“信仰的时代”。

我劝你写她，绝对不是出于怜悯，更不是想让怜悯来培养人的道德责任。道德批判，往往是拉倒车的代名词，何况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，因为在她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省悟出很多远远超出于道德的问题，关于历史，关于哲学，关于人——大写的人……

当日，是知青上山下乡。

而今，是农民进城……当年，“农民进城”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，因为那意味着武斗，意味着血腥味，被几个工分所收买或胁迫的农民一度被描绘为亡命之徒……记得，我们曾私下里议论，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锐减，而我们，几千万知青却高喊着“上山下乡干革命”的口号涌向了贫穷的乡村，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对历史的反动？……如今“回归”热似乎很时髦，又有人想作道德上的自我完善，还写出了不少作品，但当年的知青会看么？怀旧，也许是一种时代的变态心理，但有的人怀旧是不想否定自己的过去……那么，假如蓉蓉还活着，她会怎么看待这些新的完人呢？

然而蓉蓉是不会复活了的。她的生命只属于过去的岁月；而作为她这么一个人，恐怕是属于整整一个时代，这个



时代几时结束则不得而知；而她作为一个“人”，则会生存在另一个没有了宗法关系的、全新的社会到来之前。她是镜子，是倒影，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良知。

这绝不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

我也许是有些语无伦次了……炎帝，不也已被塑造为完人了么？他发现了五谷，使百姓懂得耕耘，他亲尝百草，又被封为药神，而且一日中毒七十次，最后因尝了断肠草而为民捐躯——这都是湘东山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传说。然而，就在湘东，除开炎帝陵外，还有个“南京葬”，相传是炎帝生母投崖自尽之地。为何自尽？因为她未成亲便生下了炎帝，这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传统道德的，所以她只能去死。不过，这却留下了千古遗憾，被视若神明的炎帝竟然是个私生子——中国人崇拜了几千年的偶像竟与他们自己建树的道德规范相悖逆了！

人，为什么就非得那么完美呢？

蓉蓉完美了，所以她也只能去死，否则，没有别的退路。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结论。

而今，我日日夜夜踟躕在湘东的羊肠小道上，这小道，时显时隐，时断时续，忽有忽无，通向云雾的深处，通向不可知的高峰，我就这么追随着它，任云雾从我身边飘过……也任湘东人“谏天”的咒语不绝于耳。

没人知道这“谏天”的由来。

我也不想去探究……

……

## 当年一同游乞于湘东的知青